

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城市空间特质及异化防范

□ 高春花

摘要: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美好生活日益通过城市空间找到自己的实现方式。理想的城市空间在核心意涵上具有场所性,在形态表现上具有多样性,在生成机制上具有有机性,而日常生活是催发和生成城市空间的现场和活性酶。在人类日益遭遇现代性危机的情况下,城镇化建设由于抽调或者背离日常生活,时常面临“人城分离”“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空间异化风险。由此,应该对城市空间生产和实践进行存在论、价值论、生活论的反思与建构,让城市空间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特质;异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9)05-0059-05

日常生活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购物消费、交流交往、休闲娱乐等活动,这些具有基础性、重复性、细微性特点的维系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人类活动,与城市空间具有哲学上的内在关联。日常生活的存在与发展,是城市空间场所性、多样性、有机性的内在根据,只有蕴含日常生活向度,城市空间才能呈现特质、规避异化,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载体。

一、城市空间的场所性及“人城分离”的异化防范

场所是空间的内容,是空间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空间的场所性是城市空间的核心意涵,日常活动的所在。作为一个建筑现象学范畴,场所是一个由自然和人为元素形成的综合体。理想状态的城市空间,应该以其哲学上的统一性体现出场所精神。

第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根据建筑现象学的解释,具有场所精神的城市空间蕴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在何处形成其聚落,而这又必须能够标志人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自然在何处邀请人来定居,而这种自然场所又必须通过岩石、树木、水等有意义的物,实现对人的邀请。人作为主体,一般通过“方向感”和“认同感”获得存在的立足点,他必须知晓置身何处,且在空间环境中认同自己。而一旦取得对于空间的法定占有权,这一空间就不能被剥夺。这意味着,主体必须享有空间。无论它是家里的一个床铺,还是广场上的一个角落,抑或是仅够栖身的洞穴,只有明确它的权属,才能标识人的主体性存在,一旦它受到侵犯,就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受到挑战。由此,空间是人的主体性最醒目的标识,场所是连接人与空间的最牢固的“粘合剂”。空间可能是抽象的,但是场所必然是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场所。

第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城市空间不是简单的构图游戏,而是由具体现象组成的意义世界。每个具体而微的城市空间都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旋律则是与空间密切相关的文化、历史、民族、传统等意义要素。诺伯格-舒尔茨将场所界定为“人化空间”,它由城市区位、空间形态、城市性格等表达出来;海德格尔把场所喻为“诗意栖居”的“天、地、神、人”四元结构体系,人的经历、记忆、价值观与空间发生互动,进而形成对空间的情感依赖,在这里,场所承担着拯救大地、接纳苍天、期待诸神、关怀人性的职责,人类在与环境的相互眷顾中,在诸因素交相辉映的场所精神中“诗意栖居”。总之,城市空间不是一个物理虚空,而是包含情境、归属和文化等场所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守护了场所精神,就是延续和增强了城市空间的生命活力,场所则是“空间”这个形式下的“内容”。

日常生活是城市空间的永恒主题,日常生活的在场,成就了城市空间的场所性。人们来到城市,是

作者简介: 高春花,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19-06-10

为了美好生活;人们留在城市,也是为了美好生活。城所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第一,日常生活是由人来完成的,人介入空间是构成场所精神的首要环节。海德格尔运用反证性思维,对这种“属人空间”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实体空间说”在涉及人与空间的关系时,“就好像人站在一边,而空间站在另一边似的。但实际上,空间绝不是人的对立面。空间既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并不是有人,此外还有空间。”^{[1]1199}海德格尔把日常生活的主体——人,拉回到城市空间,认为“住居”是天-地-人-神之“四端关联”,在“无”的空间里,在这些空白处,“人居留着或居住着”,“人的精神、灵魂、生活的维度,及它们的(由形而上学表象出来的)统一才首次获得其本性。

第二,人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问题带入空间,这是构成场所精神的关键环节。海德格尔把人称做“终有一死者”,把人的日常生活称为“逗留”,认为空间处处充斥着“终有一死者”的逗留,人的“逗留”使空间展现了场所精神。他以居住空间为例,分析日常生活是如何成就场所性的。他指出,在居住乃至房屋的本质中,既包括“位置和空间的关联”,“也包含着位置与在位置那里逗留的联系”。居住空间的本质,体现了人及其日常活动与空间的内在关联。海德格尔反对笛卡儿式的“静观”,主张从“人之所是”的活动中揭示空间的生发来源,并以“逗留”为核心概念揭示了人在空间中“人之所是”的活动。他指出,“当我说‘一个人’并且以这个词来思考那个以人的方式存在——也即栖居——的东西时,我用‘人’这个名称已经命名了那种在寓于物的四重整体中的逗留”^{[1]1199}。正是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说:“城市是一个纯形式……这个形式并不拥有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是吸引力和日常生活的中心。”^{[2]56}这就是说,人以及人的日常生活是城市空间拥有场所性的本体依据,日常生活状况是衡量城市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

场所和人的活动分离,必然形成异化。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如果缺失场所精神,将产生“人城分离”的空间异化风险。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标志着人类生活史的重大跃迁,城市空间也经历了一个由原初状态到异化状态再到复归正常状态的辩证历史过程。中世纪的城市,“早晨你醒来会听到公鸡啼鸣报晓,屋檐下巢穴里小鸟在啁啾,或者修道院里每个时辰传出的钟鸣,或者是城市广场上钟楼发出的钟声。人们随意哼唱起歌曲,有修道士发出的单调的咏唱,也有街面上市场里民歌手们吟咏的歌词的回荡和声……还有学徒工和女佣边工作边唱出的小曲。”^{[3]72}然而,当人类进入城市社会以后,却日益遭遇着以物质主义为表征的现代性危机,城市空间与人的生活世界相隔离,空间失去场所精神,人类失去美好家园,人城分离的空间异化现象凸显。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物质主义世界观冲淡了城市空间的场所精神,人在城市中的“缺场”,将城镇化异化为“造城运动”。在这里,“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4]23}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哲学观念渗透到城市化运动中,导致空间被异化为没有烟火气的空壳,大量空置房把城市妖魔化为“鬼城”;宽阔的马路被车辆覆盖,汽车刮起的旋风风干了生活趣味;城市节点、路径、区域的认同性被销蚀,城市地标失去了社会文化意义,空间的辨识度和整体感缺失,整个城市表现出异化的空间对人的全面统治。

第二,强劲的生产逻辑挤压了生活逻辑,日常生活的“缺场”,将城市生活异化为单向度的物质生活。在城镇化初期,为解决空间短缺问题,人们强调生产逻辑,将为人们生产住房作为恢复人道的的基础。但是,随着空间问题的逐步解决,过分执著于生产逻辑而忽视生活逻辑,容易让人迷信资本的魔法,沉迷空间的增殖,失去对生活内涵的伦理自觉,阻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体味和追寻,致使城镇化的综合风险日益增大。对此,国外都市马克思主义者步随马克思的辩证法,从日常生活的维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变迁,打开了基于日常生活的理论分析空间^{[5]42}。

列斐伏尔说:“人必须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否则他就不能存在。”他通过一系列描述界定日常生活,如生计、衣服、亲人、邻居、环境等具有物质文化性的东西,批判了排除日常生活的空间观念,强调关注空间中人的因素,倡导集聚日常生活的力量。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启示我们,应以场所精神为哲学尺度进行城市空间构建,使城镇化成为“人在城市中生活”的城镇化,而不是“城”的城镇化和“抽调日常生活趣味”的城镇化。

二、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及“千城一面”的异化防范

日常生活多样性保证了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如果割裂了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的血肉关系,必然形成

问题,比如千城一面,这些异化表达必须得到抑制。

多样性是城市空间的表现形态。空间形态可分为有形形态和无形形态。前者主要指城市物质环境构成的形态,包括结构布局、功能布局、几何形态、空间组织等;后者主要指城市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无形要素的空间分布形式。一般而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在多样化城市形态中找到实现方式,由此城市形态便成为某种生活质量的表征。城市空间包罗万象,兼具物质和精神两种特性。它不是冰冷的物质,“它是有生命的,会说话,拥有一个富有感情的核心或者说中心:自我、床、卧室、寓所、房屋;或者广场、教堂、墓地。”^{[6]40-41}有形形态的多样性表现为如下所述。

第一,城市形态中的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等要素,构成城市居民的“心理地图”。人们通过这些要素来认识城市;通过路径形态完成位移过程;通过边界形态完成自我和他者的区分;通过区域形态产生进入“内部”的体验;通过节点形态获得“进入”和“离开”的感觉;通过标志物完成对空间的独特印象^{[6]40-41}。第二,城市形态取决于多重生活面向。以圣俗性质划分,可以分“住宅”和“纪念物”;以功能划分,可分为居住空间、工作空间、游憩空间和交通空间;以社会关系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无形形态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内蕴历史传统,外显独特意象,包括城市活动主体的城市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心智状态。它凝聚了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是城市居民建立身份共识、开展共同生活的基础,是留住历史记忆、传承文化传统、彰显地域特点、展现民族风情的“文化乡愁”。比如,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具有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两者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

丰富的日常生活形塑多样性城市空间。这种日常生活包括生计、服装、家具、家人、邻里、环境等物质要素,并充满着价值、礼仪、习俗、传说等文化观念,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结合。人作为生活实践的主体,必然要从自己的目的性出发去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使客体满足自己的美好生活需求,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物质层面看,人要解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问题,客观地要求提供满足需求的空间,如人们需要住房空间遮风避雨,需要街道空间满足位移需求,需要广场空间供人们休闲,需要交通空间供人们出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超越物质追求而达到精神的充实满足,通过多样化城市空间,唤起“乡关何处”的城市记忆,找到寄托心灵的精神乡愁,实现人的“诗意栖居”。一般来说,载体越是丰富,价值的实现度就越高。空间生产和建设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城市历史、精神、价值等“装进”城墙、四合院、楼宇、街道等物质空间。在这里,古老的遗址不是历史的尘埃,而是人们分享精神食粮的自由空间;过往的文物器具不是展柜中的摆设,而是散发着历史的魅力,镌刻着城市的特定精神符号。人们置身其中,通过感受其精神气质和历史风貌,得到城市精神的熏陶和教化,产生亲切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凯文·林奇运用“领域圈”概念,通过对美国波士顿、新泽西和洛杉矶三个城市的对比,分析了城市空间中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等元素对市民记忆的重要影响,认为城市空间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要通过创造一种特征记忆,满足精神需要。

城市是异质性元素的空间集聚,如果缺失多样性,将产生“千城一面”的空间异化风险。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一味追求齐一性的城邦将不是一个城邦,或者虽然是城邦,却差不多是不算城邦的劣等城邦,就像有人把和声弄成同音或把节奏弄成单拍一样。”^{[7]41}他描述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多样性:家庭、德尔菲神庙、奥林匹克运动场、战神山议事会等组成了“闲暇公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公民的日常生活涵盖管理家政、参与政治、锻炼身体以及用高雅音乐净化灵魂等活动。然而,无处不在的城市现代性弊病,使得空间异化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工具理性延伸到城市建设领域,机械主义宰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加剧了空间生产的理性化、殖民化和同质化,无差别的物质空间充斥着城市各个角落,为便于商品交换,不惜将道路、桥梁、住房、小区、工厂等空间形式,按照相同的型号、规格、样式、规模、质量等进行生产,城市空间单调无奇,大高楼、宽马路、长街道、阔广场成为城市建设的“标配”,鲜活的地域环境被压缩为一纸干瘪的地图,齐一性城市空间模糊了人的空间认知,掏空了日常体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人不知情归何处、家在哪里。另一方面,过度工业化使许多旧有城市空间变成了高密度、高容量、物质化的商业中心、会议中心和快速干道,抹掉了以往的都市痕迹;许多有保留价值的旧有空间遭遇了断裂性、空心性改造,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历史纽带被扯断,城市空间失去了历史感和认同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为此,要摒弃“整齐划一”的空间观,强化城市有机更新,因地因时建设城市,让城市与环境相匹配;要摒弃“大拆大建”的空间观,对现有建筑进行更新改造再利用,保持原有城市肌理,彰显独特城市气质,留住城市文化,让城市空间成为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三、城市空间的有机性及“千篇一律”的异化防范

日常生活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城市空间有生命的节奏、律动。一旦日常生活不能深入城市空间,则抽象性和机械性占据城市,人的生活活动变得千篇一律。由空间的机械性和抽象性导致的生命活动的千篇一律必须警惕,尤其要重视城市规划等空间实践活动价值和意义取向。

有机性是城市空间的生成特点。其主要体现为:城市空间在产生、进化、成熟、消亡(或复兴)的过程中,空间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空间与日常生活等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它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内部充满了各种复杂性。一般而言,城市空间是计划和规划的产物。城市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生产和建设城市空间,它是自上而下进行。但是,城市空间又有自发形成的特性,这一“有序的复杂性问题”背后,存在着日常生活的自然生长逻辑,它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在空间生产实践中,城市新区建设往往需要规划先行,并在短时间大量注入资金,追求由“空间生产”效应带来的空间繁荣;但对于城市老城,或者历史性街区,空间生成的有机性特点更为鲜明,表现为基于保护、引导原则的空间的自然生长。对此,雅各布斯认为,真实的城市空间也许不能依赖于详细规划,而是自发形成于与人日常的相遇中,城市的日常生活可以自发建构城市空间^{[8]369-379}。雅各布斯最大的贡献在于,她提出“反规划”的说法,纠正了长期以来把城市规划主要用来显示权力任性、张扬规划师个人审美情趣的“秀场”的价值取向,呼吁城市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适应城市居民不断变迁的日常生活方式。比如,城市政府在按照规划打造创业园区、艺术中心时发现,往往并非先拥有一个实体建筑空间,反而是先有了一群艺术家、音乐家、写作者,聚集在一起编辑刊物、举办艺术会展、进行艺术产品的创造等日常活动,自发形成了城市空间。还比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没有正规工作,许多人靠做小商贩谋生。出于生活成本的考虑,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常常聚居于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相同的营生和境遇使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北京望京地区的“游击菜市场”就属于此类,它远离标准化菜市场,在夹缝里求生存,但远远超越了纯粹的静态空间,成为由生活哲学指导下的、多重时空编织成的真实空间。居民把菜场空间编织在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时间序列里,从而形成丰富的日常生活空间。

生活方式变迁是城市空间有机性生成的催化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城市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巨大变迁。在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相对单一,社会产品相对贫瘠,生活内容相对简单,人们契合大自然的节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冬藏,在一定意义上,其日常生活沦为周而复始、平庸无奇的日常生计。与此相应,空间生成方式也相对单一。城市社会则不然,日常生活的重大变迁,使得人们的生活面向更为复杂,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从日常生活主体上,有城市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从工作和休闲时间上,既有朝九晚五,也有夜班、夜生活;从交往上,既有受小农经济影响把自己囿于狭小活动范围内的人,也有愿意在公共领域中过公共生活的人……城市日常生活犹如万花筒,需要空间来盛载。于是,住宅、家庭设备、交通运输与都市空间之重组等,延伸了生产空间的趋势,同时剧烈地修改了其产品,而空间生产又助推了日常生活转变,丰富了日常生活方式^{[9]57}。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以特有的方式凿通了空间生产实践,营造一种空间想象,改变原有的空间安排,完成非正规性空间培育。这样的空间蕴含着无限自由和多种可能性,对富裕阶层,它是享受美好生活的物质载体;对弱势群体,它是进入城市的宝贵机会。日常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间之中,人们看似在对付空间,实乃享受无限丰富的日常生活。

城市是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如果缺失有机性,将产生主体生命与活动的“千篇一律”的空间异化风险。第一,空间规划的标准化造成了空间产品的抽象化。受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空间规划采用标准化模式,未充分考虑所在社区的人群特征与需求差异。于是,空间生产蜕变为无差别的工业化过程,原材料经过统一的“规划机器”,变为一个个标准化空间产品和标准统一的生活配套设施。这对一定时期内的城市建设,尤其是对城市新区开发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城市居民从“单位人”向“社会

人”转变、城市建设任务从新建转向更新、居民生活方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的情况下,标准化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依此模式生产出的空间犹如一种奇怪的抽象物,充斥着“内部设计的威慑”。在城镇化建设方兴未艾的当代社会,“如果未曾创造出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口号,就毫无意义。”^{[5]422}因此,要防范这种空间异化,就必须适应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创造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创造出“人的类存在的空间。”^{[5]422}第二,非正规空间的规训化造成了空间治理的机械化。规划逻辑无法阻挡人们对生活的向往,而城市空间永远也不会成为艺术品,因为生动、复杂、积极的生活本身也会有机生成一些非正规空间,如马路菜摊、弄堂菜摊等非正式的、流动的空间就属此类。它们不受政府部门管制,表面上是规划图纸上的“无序”,实则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待这些非正规空间,城市政府常常因“秩序”的考量予以取缔,以规训的方式实现空间治理。按照德赛图的理论,人在特定环境中,既要服从特定规则,又要在既定规则中寻求个人生存空间,而“抵制”则意味着存在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一个是政府的压制性和支配性权力,另一个是弱者在非正规空间的游击战争。在此情况下,与其简单取缔非正规空间,不如以一种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去看待非正规空间,通过物质改造、政策引导和精细化管理,将其融入城市正规空间,根据空间认知与反馈,及时进行有机修正,科学调节正规空间和非正规空间,提高空间使用效率。

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梦究其根本是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之梦。在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50%的今天,实现生产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协调发展,建立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化解空间异化的现实风险,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德)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 [2]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4]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s of the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 [6]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8] Bridge G, Waston S, Chapter 31. *City Publish, A Companion to the Cit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 [9] (美)亨利·列斐伏尔:《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tial and Prevention of Alienation Based on Daily Life

GAO Chun-hu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etter life increasingly finds its own way of realization through urban space. Ideal urban space has locality in its core meaning, diversity in its form and expression, and organicity in its generating mechanism. Daily life is the largest phenomenal field and active enzyme that promotes and generates the locality, diversity and organicity of urban space. I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 encountering more and more modernity crisis,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often faces risks of spatial alienation such as “separation of man and city”, “similar expression for a thousand cities” and “set form for all cases” because of its diversion or deviation from daily life. Therefore, we should reconsider and construct the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of urban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tology, axiology and life theory, so that urban space can truly become a significant carrier of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urban space; daily lif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lienation risk

责任编辑 吴兰丽